

跨国界的追寻

——世界华文文学诠释与批评

朱文斌

著

跨国界的 追寻

——世界华文文学诠释与批评

朱文斌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跨国界的追寻：世界华文文学诠释与批评 / 朱文斌著.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3

ISBN 7-80148-980-2

I. 跨... II. 朱... III. 中文 - 文学研究 - 世界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139812号

跨国界的追寻

——世界华文文学诠释与批评

朱文斌 / 著

责任编辑：丁纪红

装帧设计：林琳

责任印制：韦舰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刚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邮政信箱：北京市东四邮局7号信箱 100010

电话：010-65270477

传真：010-65270449

销售热线：010-65122133

E-mail: newstar_publisher@163.com

印刷：河北大厂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00×965 1/16

字数：182千字

印张：18.75

版次：2006年3月第一版 2006年3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3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序

陈贤茂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王静安在《人间词话》中，以柳永的词来形容古今成就大事业大学问者所必经的第二种境界，我则借用这两句来形容朱文斌从事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执著精神，以及不屈不挠的拼搏和无休无止的追求。

朱文斌是我退休之前招收的最后一名研究生。记得在他入学之前，曾来汕头大学面试，一开始就给我很好的印象：谦逊，热情，开朗，谈吐举止，都给人厚道、踏实的感觉。

面试时提些什么问题，已经忘记了，但有一个问题却记得很清楚。记得我当时曾问道：“你为什么选择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作为你未来从事的专业呢？”他答道：“为了弘扬中华文化，传播中华文化。”

就凭着这个回答，我已经决定要录取他了。

入学之后，朱文斌确实没有使我失望。他学习非常刻苦，一年之后，他的文章就已在报刊上发表，而且还参加了我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史》的撰写工作，成为我的得力助手。

就在他的研究才能崭露头角的同时，他的处理人际关系的艺术和活动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发挥。在人际关系中，他讲究诚信，圆融，和而不同，几乎是上下左右的关系都处理得很好，因而在研究生中赢得了威信，并当选为学生干部。他家在农村，家庭经济并不宽裕，因此他必须通过家教、代课之类的兼职来贴补生活费用。不到半年时间，他对汕头市的各种兼职渠道都摸得很熟，甚至连汕头本地人都得通过他的渠道来获得

兼职的位置。我曾对其他老师开玩笑说：如果朱文斌从商的话，一定是董事长、总经理的最佳人选。

毕业之后，朱文斌并没有从商，而是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如今，他已获得博士学位，还在做博士后研究。我过去教过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生，目前多已转行，或只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作为副业。仍然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作为主攻方向的，朱文斌是唯一的一位。

短短数年时间，在朱文斌执教的绍兴文理学院，相继成立了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所，创办了《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丛刊，最近又开通了中国大陆第一个“世界华文文学创作和研究”网站。绍兴文理学院从一个过去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毫无渊源关系的高校，一跃而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重镇，令人瞩目。这一切成绩的取得，当然与学院领导的支持分不开，但朱文斌作为主其事者，也是功不可没。汕头大学过去也曾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重镇，但现在时过境迁，那种热闹景象已大不如前了。不过，令人欣慰的是，绍兴文理学院正在成为沟通海内外华文文学界的桥梁，成为海外华文文学作家关注的焦点，成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坚强堡垒。当然，现在一切都还在草创阶段，由于人手和经费的不足，限制了发展的规模。朱文斌未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跨国界的追寻》是朱文斌的第一本论文集，内容包括“华文诗歌研究”、“华文文学研究之研究”和“华文作家研究”三个部分，基本上涵盖了他数年来的研究范围，也展示了他这几年的研究实绩。

“五四”以来的大作家、大学者，都是学贯中西的，朱文斌显然也是有意识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论海外华文诗歌与中国诗学传统的关系》一文，显示了朱文斌对中国传统诗学的深厚学养，而在《论东南亚华文诗歌的现代化》、《荒诞与超

越》、《物虽胡越 合则肝胆》等文中，则显示了他对西方的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文艺思潮也深有研究。当今的中国，正处在数百年来最好的发展时期，有出息的中国文学家，不仅要有坚定的民族自信心，更应该敞开自己的胸怀，以汉唐的宏伟气魄，去吸纳八面来风，接受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任何抱残守缺、泥古不化，或是崇洋媚外、全盘西化，都是不可取的。我们既要纵的继承，也要横的移植。朱文斌在《论东南亚华文诗歌的现代化》一文中，显然就是中国诗歌传统与西方艺术经验的融合，作为华文诗歌现代化追求的目标，这无疑是一种正确的选择。当然，作为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作家、学者，只会继承和移植，那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在继承和移植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这无论对于创作或是研究，都应该是努力的方向。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台湾的“台独”势力就刮起了一股“去中国化”歪风，为他们的“文化台独”政策服务。流风所及，也影响了海外华文文坛。在东南亚，一些有留台背景的学者，就曾借用后殖民主义理论，把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影响，看作是一种文化霸权，并倡导“去中国性”谬说。朱文斌在《论东南亚华文诗歌与中国性的关系》一文中，不仅对东南亚华文诗歌与中国性的不同阶段的关系有精辟的论述，而且对这种“去中国性”谬论也给予了批驳，显示了他看问题的敏锐和善于透过表象看到本质的能力。可惜因限于篇幅，没有很好展开。

同一语种之间的不同国家文学的相互影响，与殖民地宗主国凭借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优势，对前殖民地国家实施文化霸权，这完全是两码事。18世纪，当英国人越出英伦三岛，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站稳脚跟，并建立起新的国家之后，英国文学就曾对这些国家的新兴文学有过强大

的影响，而现在，则是美国文学反过去影响了英国文学。只要采用同一种语言作为表达工具，则不同国家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永远存在。任何“去英国性”（如果过去曾有过这种提法的话）或是“去中国性”，结果都将是徒劳的。

本书的第二部分是“华文文学研究之研究”，这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以前还没有过，因而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收在这部分中的五篇文章，集中在亚洲部分。作者对几十年来海内外学者研究亚洲华文文学的论著，搜罗相当齐备，显然花了不少的心力。更难得的是，作者在阐述这些论著内容的同时，又加上了自己的评断，总结其经验教训，以期今后的研究能更上一个台阶，颇值得嘉许。

20世纪90年代的马华文坛，曾发生过几场论战，如关于“中国性”的论战，关于“断奶”的论战，关于“经典缺席”的论战。作者在《新马华文文学研究述评》中，对论战双方的观点作了详细地描述，使读者能窥见这几场论战的概貌。然而，当读者急于想知道作者对论战双方的观点的评判和态度时，却颇感失望。作者在这里似乎充分发挥了他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的特长：圆融，通达，和为贵。当然，在和为贵的前提下，有时也能找到一些扑朔迷离的评断，片言只语，微言大义，颇类春秋笔法。至于读者能否领会，那就看各人的悟性了。

《跨国界的追寻》是朱文斌的第一本书，据我所知，他手头还有两本书正在撰写中。只要这种努力拼搏的精神能够持续下去，假以时日，他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必将大有作为。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王静安在《人间词话》中，以辛弃疾的词比喻古今成就大事业大学问者所必经的第三种境界。这是苦苦追求之后的顿悟，是艰

苦努力之后的大彻大悟。我借用这几句来作为本文的结束，也期望朱文斌能早日达到此等境界。

2005 年 10 月 7 日

于汕头大学

启用“追寻”突显世界华文文学
研究方才起步，
今后还需不断地追寻；
其实，
批评之路实乃无尽追寻之路。

CONTENTS

目 录

- 001 序/陈贤茂

第一辑 华文诗歌研究

- 003 论东南亚华文诗歌与中国性的关系
010 论民族主义思潮对早期东南亚华文诗歌的影响
024 世界性、本土性与中国性
039 论东南亚华文诗歌的现代化
054 论海外华文诗歌与中国诗学传统的关系
069 荒诞与超越
081 物虽胡越 合则肝胆

第二辑 华文文学研究之研究

- 093 新马华文文学研究述评
166 泰国华文文学研究述评
182 菲律宾华文文学研究述评
193 印尼华文文学研究述评
201 文莱、越南、日本、韩国华文文学研究述评

第三辑 华文作家研究

- 213 文莱华文作家（劭安、煜煜、一凡及文莱其他
华文作家）
- 236 印尼华文作家（林义彪、明芳、立锋）
- 261 澳大利亚华文作家（庄伟杰）
- 268 美国华文作家（谢家孝、吴玲瑶）
- 285 后 记

第一辑

华文诗歌研究

论东南亚华文诗歌 与中国性的关系

如果将海外华文诗歌主要分成东南亚和欧美澳两大板块的话,无疑,东南亚华文诗歌更受世人瞩目,它不但发生历史早,几乎与中国现代诗歌同时起步,且创作繁荣,拥有自己的文学机制及流通、消费市场,因而独具一格。而欧美澳华文诗歌,自20世纪50年代诞生以来,至今还依赖于中国大陆及港台文学市场,摇摆于“留学生—移民—新移民文学”之间,无法形成自己的“文学场”。由于政治格局、社会体制、人文环境都迥然相异,东南亚华文诗歌与欧美澳华文诗歌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但是二者在一定的抽象层次上及一些基础的物质层面上还是互通、对话着的。例如二者都是运用同一语种(华文/汉语)创作,在当地处于第二层次或边缘地位,最为重要的是,中国性如“幽灵”般出没于它们的创作中,使两大板块的华文诗歌无法忘却/割断与中国的联系。中国性,英文表达为 Chineseness,也可译为“中华性”,简言之,就是中国特性、中国特色和中国特质之义。马来西亚旅台学者、作家黄锦树曾言:“‘中国性’这个‘西而不化’的名词,虽然也可借晚清流行的词语译为‘国粹’、‘国性’,或译为比较中性的‘中国特性’,然而前者或失之‘古雅’,后者却又失之‘平庸’,在性别论述蔚为主流的当代,读不出‘差异’的趣味。”^① 目前看来,中国性的译法已为学界所接受。中国性有别于中国(实体),是文化想象的产物,其根基是建立在对华族文化认同之上的。它不具有一个固定的本质和意

^① 黄锦树:《马华文学与中国性》台北元尊文化,1998年版,第41页。

义，并且是流动不居的，跟现代性的流动感十分相似。因此，我们很难给它下个确切的定义。

东南亚华文诗歌与欧美澳华文诗歌都摆脱不了中国性的影子，但中国性在它们当中所呈现的姿态并不一样。对于欧美澳华文诗歌而言，中国性呈现的方式较为单一。因为迄今为止，欧美澳华文诗歌的书写群体还带有较浓厚的移民色彩，他们身在现代化的西方，却固守着中华文化传统，表现出较为纯然的汉民族思维方式。例如美国学者黄运基（他在美国已生活了五十余年，早已加入了美国籍）曾现身说法说：“就国籍法而言，真正称得上‘华侨’的，实在已为数不多。但这里之定名‘华侨’，则是广义的、历史的、感情的”，“美国华侨文化有两个特定的内涵：一是它在美洲这块土地上孕育出来的，但又与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紧密相连；二是在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的华裔，他们受了美国的文化教育的熏陶，可没有也不可能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他们也在觅祖寻根。”^①说明欧美澳板块的华文书写者并没有为中国性所困惑，他们十分鲜明地意识到中国性作为一种文化认同，体现着一种强大的凝聚力。关于这一点，悉尼大学华裔教授洪美恩曾在一篇题为《中国性的移民》的书评中说：“‘中国性’是海外华人‘想象社群’（Imagined Community）的核心，它是一个公开的能指，也是一个共同的所指，它内部的差异性、特殊性和分裂性是无法抹杀的。而它们恰恰也是统一和集体身份的基石所在。”“‘中国性’可被视为斯皮沃克所说的‘策略本质主义’（Strategic Essentialism）的不同形式，它们不是督促移民‘回家’，而是希望其他人认识到，他们的所言和所为是出自特定的历史和文化。”^②中国性在欧美澳华文诗歌这一板块没有表

① 黄万华：《文化转换中的世界华文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② 陆杨：《“中国性”的文化认同》，《文艺报》，2003年8月26日。

现出过多的负面效应或者说负面影响，没有被“妖魔化”。反过来，中国性被看成是欧美澳华文诗歌的一大特色，提醒着人们认识“他们的所言和所为是出自特定的历史和文化”，即中华文化。

对于东南亚华文诗歌来说，中国性的呈现方式则远为复杂暧昧得多。如果将其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分成三个大阶段的话，即（一）20世纪20年代初至50年代初，（二）50年代初至80年代初，（三）80年代初至今，那么这三个阶段的中国性呈现则差异明显。

第一阶段（20年代初至50年代初）的东南亚华文诗歌基本上属于“侨民文艺”时期，中国性作为一个特质非常抢眼地呈现于诗歌文本之中。由于这个时期的创作者大多为南来诗人，他们在身份意识上认为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中国人，虽然这些中国人有时也含有强烈的在地激情，但在精神指向上无一例外地属于中国迷恋，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很难将他们的创作与中国现代诗歌创作严格区分开来，比如谭云山的诗集《湖畔》1930年由广州的青野书店出版，却被认为是马华文坛第一部诗集^①。由此可见，中国性浮现于这一时期是无可非议的。并且，中国性虽然遭到了本土性的对抗，但这段时期中国所发生的政治事件如国民革命、抗日战争很快消弥了本土性微弱的声音，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东南亚各国相继独立，东南亚华人的心态才由“叶落归根”向“落地生根”转变，本土意识/本土性才重新取得与中国性对话的权力。

第二阶段（50年代初至80年代初）是东南亚华文诗歌发展最为艰难坎坷的时期。东南亚各国在世界民族解放大潮影响下，

^① 陈应德：《马华诗歌发展简述》，《马华文学七十年的回顾与前瞻：第一届马华文学研讨会论文集》，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1991年版，第125页。

摆脱西方殖民统治而独立成新兴民族国家之后，由于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作祟，先后掀起了“排华”浪潮，华文诗歌的发展遭受空前重创。一方面，东南亚华人已经“落地生根”，自觉将自己看成是新兴国家的一分子；另一方面，新兴国家并不放心他们的存在，以各种名义以及出台各种政策限制他们的言行，试图设法同化他们。这种滑向边缘的生存方式，使得东南亚华人无所适从，华人再移民成为一时之景观。在此背景下，陷入困境中的东南亚华文诗歌迫不得已向文化母体寻求动力/支撑似乎非常必要。因而，这个时期中国性的呈现带有主动找寻的意味。即使是受台湾和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涌现出带有现代主义色彩的诗歌也不例外。比如 70 年代马华诗坛出现以温任平为代表的天狼星诗社，他们所创作的诗歌就被称为“中国性的现代主义”（黄锦树语），他们在诗歌韵脚、格律、句法、章法、意象等形式与构思方面，皆有相当娴熟的中国性表现。再如 70 年代末新华诗坛出现的五月诗社，从其以“五月”（五月初五端午节，纪念伟大诗人屈原的日子）命名就可看出诗人们传承中华文化传统的心志。

第三阶段（80 年代初至今）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文化上的后现代主义、政治上的后殖民主义拓展了人们的视野，全球化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尤其是进入 90 年代之后，东南亚华文诗歌的多元化格局已成定势，但不论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还是在后现代主义阵营里，依然有相当一部分写作者迷恋于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性问题仍然较为突出，只不过呈现的方式更为隐晦暧昧而已。这与东南亚华文诗坛繁复的面貌与格局是相对应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新时期东南亚华文诗歌在诗质、诗艺等方面有待提高的地方还有很多。许多论者已经看到，东南亚华文诗歌不论是追逐西方潮流（现代性），还是跟随中国大陆、港台诗坛（中国性），都很难真正提高自身特质。它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形成自己的特色，独树一帜，与世界诗坛取得平等对话的